

自珍論「六經」與「六藝」 的第一? 傳統學術知識分化

著者	張 壽安
journal or publication title	Higashi ajia ni okeru gakugeishi no sogoteki kenkyu no keizokuteki hatten no tameni
volume	31
page range	209-225
year	2013-03-15
URL	http://doi.org/10.15055/00002569

龔自珍論「六經」與「六藝」 ——傳統學術知識分化的第一步*

張 壽 安**

中文摘要及關鍵字

中文摘要：「中國近代知識轉型」是近年來學界新興的重要議題。欲探討中國近代知識轉型，除了分析近代西方科學式知識如何在中國建構之外，中國本身的轉變絕對是不可忽略的議題。清代學術位居近代轉折之關鍵，其學術特色與認知，代表前近代學者對傳統學術及其發展之重要反思。本文就以晚清重要學者龔自珍為焦點，說明他如何從「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學術史觀點，上溯《漢書·藝文志》，分判「六經」與「六藝」，一則為經學的千年傳統釐出一個統序，建立起經學學術史觀；進而梳理出六藝的知識系統，並直接與乾嘉以降所新興的專門之學分相屬，勾勒出六藝之學的專業分化。這個觀察，不僅說明傳統經學在前近代中國所呈現的分化情形，也展現出清儒對傳統學術所作的初步知識層構。

關鍵字：清代學術思想史，龔自珍，六藝，六經，知識分化。

英文題目、摘要、關鍵字

Title: Knowledge Classification in Gong Zizhen's Views on the "Six Arts"

Abstract: The transformation of knowledge in modern China has emerged as a critical topic in recent scholarship. To explore China's turn to modern knowledge, it is absolutely necessary to understand the changes occurring within China itself, as well as how modern Western scientific-style knowledge was constructed in China. The scholarship of the Qing period was a key transitional point, which is seen in the nature and recognition of scholarship as represented by important early modern reconsiderations of traditional scholarship.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important late Qing scholar Gong Zizhen, analyzing how he traced Zhang Xuecheng's historical view of "bibliographies and schools" back to the "Yiwen zhi" of the *Hanshu*, distinguishing the "Six Classics" and the "Six Arts" in order to systematize the millennia of the classical learning tradition by establishing a historical view of this tradition. Gong further built a knowledge system based on the Six Arts, outlining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and specialization of the learning of the Six Arts based on the new areas of expert knowledge that had emerged since the eighteenth

* 本文初稿曾報告於「儒學文化的近代轉型國際學術研討會」（國際日本文化研究センター主辦，日本，京都，2007年3月22-25日），感謝鈴木貞美、孫江、楊念群、黃興濤、方維規、馮天瑜等教授所提意見；本人獲益良多。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century. In this way, we can not only explain how traditional classical learning was expressed in various classifications but also reveal the preliminary knowledge construction of traditional scholarship by Qing Confucians.

Keywords: Qing intellectual history; Gong Zizhen, “Six Classics,” “Six Arts,” knowledge classification

「中國近代知識轉型」是近幾年來學術界新興的一個重要議題。海峽兩岸和東亞歐美學界都組成團隊進行研究，並展現相當成果。欲探討中國近代知識轉型，除了分析近代西方科學式知識理念體制在中國的建立過程之外，中國本身的轉變也是不可忽略的議題。更何況任何近代知識理念或體制在輸入和接榫的過程中，傳統文化系統都扮演著緊要的認知和裁奪力度。唯有兩廂對照，方能在分明涇渭之際，鉤沈出傳統學術的特質，進而重建吾國學術之知識體系。欲瞭解傳統中國學術的近代轉型，作為近代早期的清代學術絕對是重要關鍵之一。本文就以清代學術為焦點，作一試探性觀察。

一、前言——一個學術史角度的觀察

學界研究清代學術思想史，可大略分為四個範疇：經學、史學、思想、科技，從學術史角度切入者並不多見。把學術史視為思想史的內在理路，應是上世紀六零年代以後的轉進，二十世紀初，恐非如是，在清代，也非如此。今人將學術性的研究皆視為學術史研究之一環，然而在清代所謂學術史則有特定的研究關懷。然則所謂學術史的角度是什麼呢？那就是劉師培（光緒 10 年-民國 8 年，1884-1919，年 36）提示的「校讎古籍出於章學誠」，也就是章學誠（乾隆 3 年-嘉慶 6 年，1738-1801，年 64）提出的校讎學理論「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主要目標是：梳理三代以上、周秦、秦漢以降的學術流變，對各種學問之間的源流分衍，提出分辨，劃出畛域。學界有名之為「校讎學」者，¹ 有名之為「流略之學」者，² 有名之為「學術史」者。³

本人長期研究清代學術思想史，近年來逐漸察覺清儒有一「學術史」建立之潛流。這股潛流起於清初，漸形明朗於清中葉。據目前觀察，汪中（乾隆 9 年-59 年，1744-1794，年 51）、章學誠或是最要代表；到中、晚清學術史觀大開，阮元（乾隆 29 年-道光 29 年，1764-1849，年 86）、龔自珍（乾隆 57 年-道光 21 年，1792-1841，年 50）則居轉折關鍵。這股學術史觀的出現，從萌芽到開展，和清儒輯佚、校勘、訓詁、考證的學術工作一路雙脈並進。古學鉤沈打開了清儒的學術視域，清儒的學術意識也層層上轉，返本探源，考證工夫背後的「學術史意識」亦逐漸形成，學術論辯的議題、性質和層次也一步步提升。從爭朱陸——理學內部的正統之辨，到爭漢宋——儒學內部的正統之辨，到建立孔曾學脈、孔荀學脈——打破孔孟道統唯一之說，到六經皆史——經史地位之爭，再到孔墨學派相埒——孔子乃諸子之一，再到

1 詳劉咸忻：《續校讎通義》（臺北：廣文書局，1972 年）。

2 余嘉錫：〈書章實齋遺書後〉，《余嘉錫論學雜著》（北京：中華書局，1963 年），下冊，頁 619。

3 蔣伯潛：〈目錄與學術史〉，《校讎目錄學纂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 年）。

六經皆文——文學地位的提昇，紛紛紜紜，波瀾壯闊，終至上探千古學術之原，對「秦漢學術」、進而「先秦學術」作出全面大反思。令經、史、子、文、技、藝之學的地位和價值都起了革命性的變化，千古學術也面臨重新統系。這種全面性的學術梳理，恐非梁啟超（同治12年-民國18年，1873-1929，年56）「節節復古」⁴一語所能囊括。目前學界對此議題尚無多留意，一般而言，學界頗認為「學術史」是晚清民初從日本引進的概念與學科。唯本人近年來研究汪中、章學誠、阮元、龔自珍等的學術史觀，深深察覺清儒本就有此一傳統，晚清梁啟超、劉師培等人的學術史視域和論著未必皆襲自日本，康、梁以上，自有傳承。

2006年發表〈打破道統龔重建學統——清代學術思想史的一個新觀察〉，即以阮元學圈為中心，討論「專門漢學」的學統重建工程。這個大盛於乾嘉的漢學意識，鉤沉出「鄭玄學」、「說文學」，也梳理出許鄭之學的流行學脈，尤其詁經精舍建立「許慎鄭玄祠」，大異於當時書院崇祀朱熹的傳統；四十年後俞樾（道光1年-光緒32年，1821-1906，年86）、章樞（咸豐11年-民國38年，1861-1949，年89）統紹前修，完成阮元未竟之志，增立「許慎鄭玄祠從祀制」，考證出許鄭之學由漢唐至清的傳承譜系，所增四十七位傳經之儒，無一宋明理學家。兩厝學統之異，清楚可鑑。⁵阮元學圈從事的學統梳理工程尚不只此，《疇人傳》的編撰，更是統緒出技藝之學的千年譜系。這些孜孜矻矻的學統重整工程，並非為考證而考證，亦非迷失了義理的方向，而是在其背後有一千古「學術史」的理念等待釐清。本研究即欲發掘此一理念。⁶

「打破道統」一文發表後，學界對道統豈可打破反應相對熱烈，而筆者則持續關懷學統重建議題。首先，學統重建並不是欲恢復某一特定之學術譜系，而是學術史觀的逐步開啟與學門的各自建立。其次，學統重建也不是「儒學開出近代專門知識」云云。⁷事實上，學統重建，已不再囿於儒學的範疇。學統重建，是對先秦、秦漢乃至兩漢以降之學術，作統脈式的探源述流。此一全面性反思，立基於清儒的學術掙扎成果，包括鉤沈古學、分梳舊學、創發新學，因此絕非理學、儒學、或孔學這些特定性質的學術範疇所能涵蓋。初步觀察，它展現在：經/史、經/子、經/文、文/史、史/子、文/子的學科劃分，並史學、子學、文學、技、藝之學的獨立與地位提升。再次，也得指出晚清和清中葉所面對的學術挑戰不同，晚清學界面對的最大衝擊是中西學術交會，而清中葉學者面對的則是五、六百年以來「道學主導儒學傳統」之後的學術重整。學術的對話者不同，議題和詮釋當然有異，在相當程度上得分

4 「自宋以後，程、朱等亦偏注諸經，而漢唐注疏廢。入清代則節節復古。」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臺北：里仁書局，2000年5月），頁63。

5 張壽安：〈打破道統龔重建學統——清代學術思想史的一個新觀察〉，《中央研究院近史所集刊專號：中國近代的知識轉型——1600-1949》，52期，2006年6月，頁53-112。

6 近年來學界又提重新詮釋清代學術思想史，和30年前（1976）余英時先生提出「我們為什麼要重新詮釋清代思想史」的針對方法論和文字獄，在關懷上已有很大不同。羅志田：〈國無學不立：重建國學的努力〉，《國家與學術：清季民初關於「國學」的思想論爭》（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1月），頁33-82、余英時：〈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1975年2月），〈略論清代儒學的新動向——論戴震與章學誠自序〉（1975年9月），二文後收入《歷史與思想》（臺北：聯經出版，1977年）。專書為《論戴震與章學誠》（香港：龍門書店，1976年）。

7 牟宗三曾提出「良知自我坎陷開出民主、科學」之說，相關評論參考李明輝：〈儒學如何開出民主與科學？〉收入《唐君毅思想國際會議論文集》（香港：法住出版社，1991年），第4冊，第125-140頁；並刊於《原道》，第6期（2000年6月），頁369-384。

別討論，不宜比附。本文的關懷屬於後者，即清中葉的學術轉型。

這個從學術史角度切入的研究和先前學術界所討論的漢宋之爭、清代禮學、清代新義理學都不相同。基本上，上述研究仍偏向思想史、研究方法、或儒學的性質等，和「學術史觀」之建立，分屬不同範疇。後者的視域已擴展到先秦，要探究的是三代學術本源、要梳理的是經、史、子、集與周秦兩漢以降的百家學術流變，不僅不限於儒學也不限於任何一家一派。本研究的目的，就是要瞭解清代這些超卓之士，他們的學術史觀如何建立、如何論述、並對傳統經、史、子、集之分類與地位如何進行重省。當然，本研究也期望能藉此說明清代考證學背後的學術史意義。

在初探阮元之後，本有意向下順尋此一學術史意識的發展，亦有心上溯，探其萌端。兩相拉扯，頗費了一些時間瞭解章學誠、汪中，最後鎖定龔自珍作下一個研究目標。原因是多重的：1，龔自珍是段玉裁（雍正13年-嘉慶20年，1735-1815，年81）的外孫，有極深厚的樸學素養；2，章學誠提出六經皆史，龔自珍極可能是第一個從經學角度作出回應的學者；3，龔自珍受學劉逢祿（乾隆41年-道光9年，1776-1829，年54），深蘊常州公羊學的變革思想。

龔自珍在學術史觀建立上的貢獻是很多方面的，⁸ 本文選擇最重要的議題——「經學」——作為焦點，討論龔自珍如何梳理「經/經學」？又如何分判「六經/六藝」？為經學的千年傳統釐出一個統序，建立一種史觀；並經由六經/六藝的分判，觀察龔自珍如何董理千古學術、建立知識系統；同時也揭明他如何總結清學發展出的專門之學，將其與六藝分相屬。

基本上，六經作為中國傳統學術的中心，屬一種「百科全書式」的知識。清儒實事求是的說經方法，不僅鉤沈出豐富的古學，也在實踐過程中發展出多樣專門知識。龔自珍從「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學術史觀點，上溯《漢書·藝文志》，釐清「六經」與「六藝」，進而梳理出六藝的知識系統，直接與乾嘉新興專門之學相。這個觀點，不僅說明傳統經學在前近代中國所呈現的分化情形，也為清代學術史的研究開出一個新視域。前者可為今後治經學者參考，後者則可為近年來學界關注之「中國近代知識轉型」議題提供一條線索。

本文分三部分：一，說明何謂六經？何謂經學史？二，分析六藝的知識分化。三，解釋知識擴張所產生的意義。

二、釐清「經/經學」——建立「經學學術史」

今日學界言「六經」，經的數字為六，已是共識。殊不知這是劉師培在1905年《經學教科書》中提出的重要定義。其實，經的數字在中國歷史上有多次增減，而經目在歷代也每每不同。秦、漢時有六經、五經、七經，唐以後有九經、十二經、十三經，到了清代更有十七經、二十一經之說。「經數」與「經目」的變易，是經學史上的重要事件，雖然現今的經學

8 關於此一議題，本人另有兩篇文章，敬請參考：〈龔自珍論乾嘉學術：說經、專門、與通儒之學——鉤沈一條傳統學術分化的線索〉，收入《中國學術思想論叢——何佑森先生紀念論文集》（臺北：大安出版社，2009年4月），頁275-308。〈六經皆史？且聽經學家怎麼說——龔自珍、章學誠論學術流辨之異同〉，田浩編，《文化與歷史的追索——余英時教授八秩壽慶論文集》，頁273-305，台北：聯經出版社。

史已罕見論及，令人遺憾。龔自珍的時代，所面對的，正是經數的不斷增加。然則，龔自珍為何反將二十一經縮回為六經？又如何為六經正名？從學術史（尤其是經學學術史）之發展的角度觀察，龔自珍「六經正名」的意義何在？影響如何？是本小節的討論重心。

「六經」一詞最早出現在《莊子·天運》，指《詩》、《書》、《禮》、《樂》、《易》、《春秋》。《禮記·經解》所列六經經目也與《莊子》同。據《史記·儒林列傳》所言「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藝從此缺焉」。漢興，樂經失傳。所以漢武帝所置五經博士，沒有樂經。漢章帝時《白虎通》所述五經的經目是：《易》、《尚書》、《詩》、《禮》、《春秋》。也不含樂經。至於「七經」之說，大約起於東漢。蓋漢代崇尚「孝治」，又推尊孔子，故納《孝經》、《論語》於五經，遂稱為七經。在此我們看出，因為政教的需要，經的內容也漸次擴大，數與目都在變化。到了南北朝時，經數與經目的變化轉劇。劉宋時設國子助教十人，分掌「十經」。所謂十經是把五經中的《禮》分為三（《禮記》、《周禮》、《儀禮》），《春秋》也分為三（《春秋左氏傳》、《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再把《論語》、《孝經》合為一經，共十經（其實是十一經）。到了唐初陸德明的《經典釋文》，經數減為九，去除《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序錄〉裡敘述經學源流時，把《老子》和《莊子》都列入經典，位置還在《爾雅》之前。顯然，這是因為唐代「上承六朝盛談玄學之後，而唐初又昌言道教，故老、莊二子，亦與於經典之列。」⁹完全反應了時代的變化。又據顧炎武言：「自漢以來，儒者相傳，但言五經，而唐時立之學官，則云九經者，三傳、三禮分而習之，故云九也。」¹⁰這是指科舉考試的分卷分房，士子可擇經應試。唐宋取士皆用九經，即指三《禮》、三《傳》、合《詩》、《書》、《易》，遂為九經。今所見唐文宗開成二年（837）所刻楷書十二經，則是增加了《論語》、《孝經》、《爾雅》。¹¹這十二經實際上已經粗具了今日所謂十三經的規模。到宋末，經數與經目產生了劃時代的意義。一則結合開成所刻十二經和宋儒推重的《孟子》，併為十三經，這當然是因為理學家「孫奭及二程子表彰孟子之學也。」¹²二則也因為當時鑄版盛行，書籍流傳勿需手抄，遂有「合刻本」的十三經注疏本，流傳於世。從此，十三經之名遂一定不可復易，此後學界所論十三經，皆依此規模。¹³

然則，宋元以後道學大盛，影響經學甚重，不可不言。蓋宋時程、朱道學大儒輩出，始取《禮記》中之兩篇文字〈大學〉〈中庸〉，及《孟子》以配《論語》，謂之《四書》。朱子歿後，朝廷以其四書訓說立於學官，於是《四書》亦為一經，經元、明、清三代不變，《四書》遂與《十三經》敵體並立，納入科舉，經典的訓釋與流傳性質，頓生劇變。我們試看清初納

9 程發軔：《國學概論》（臺北：正中書局，1994年11月），上冊，頁27。又說章學誠「《文史通義》以梁武帝崇尚異教，佛老書皆列於經。」

10 顧炎武著、黃汝成集釋、秦克誠點校：《日知錄集釋》（湖南：岳麓書社，1996年），卷38，〈十三經注疏〉，頁641。

11 周予同：《中國經學史講義》，收入朱維錚編：《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增訂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頁852。

12 程發軔：《國學概論》，上冊，頁28。周予同亦言：「至宋代，又將《孟子》列入經，因而有十三經之稱。」《中國經學史講義》，頁853。關於歷代經數的變化，參考程發軔書，頁22-29；周予同書，頁845-853。

13 關於《十三經注疏》的出現和宋真宗以降延續唐代《五經正義》為諸經撰「疏」密切相關：《十三經注疏》的合成，或言北宋之季或言南宋光、寧以後。詳馬宗霍：《中國經學史》（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2年），頁107-115；並參考安井小太郎等著龔連清吉、林慶彰合譯：《經學史》（臺北：萬卷樓出版社，1996年），頁115-119。

蘭成德（順治 12 年-康熙 25 年，1655-1685，年 31）所編《通志堂經解》所列諸經之目，即可見一斑，計：《易》、《書》、《詩》、《春秋》、《三禮》、《孝經》、《論語》、《孟子》、《四書》。馬宗霍在論及宋以後十三經合刊本流傳所造成的學術影響時曾言：「是故唐以前但有官學，宋以來又有官書，其於扶翼聖道，豈曰小補之哉。」¹⁴ 從官學到官書，確實改變了經之為學的性質。據此我們不難看出，「經」在傳統學術的發展中，並不是鐵板一塊，從不更改。其實它是隨著時代的政治思想與文化價值需求，而不斷挪移。經數與經目的變化，正反映著學術內部的張力與弛力，一代擴及一代。

到了清代，變化更加劇烈。康熙朝御纂的七經，指：《易》、《書》、《詩》、《春秋》、《周禮》、《儀禮》、《禮記》。顯然，禮學在清代極度受到重視。乾隆初專門漢學漸興之際，四世傳經志在存古學的惠棟（康熙 36 年-乾隆 23 年，1697-1758，年 62），提出的《九經古義》是：《易》、《書》、《詩》、《春秋》、《禮記》、《儀禮》、《周禮》、《公羊傳》、《論語》。相較於康熙皇帝，惠棟更推崇春秋學，尤其屬意於「公羊大義」，把《春秋》和《禮》結合起來闡釋，不能不說是惠棟經學的另一特點。¹⁵ 納蘭成德編纂的《通志堂經解》，亦取九經之數，但經目則不同於惠棟，計：《易》、《書》、《詩》、《春秋》、《三禮》、《孝經》、《論語》、《孟子》、《四書》；基本規模還是承襲宋明舊制。至於戴震（雍正元年-乾隆 42 年，1723-1777，年 52）的《七經小記》，則是取《詩》、《書》、《易》、《禮》、《春秋》，外加《論語》、《孟子》；相較於惠棟的析禮為三、特舉公羊、不取《孟子》，顯然戴震的經學視域仍具有濃厚的徽學氣息，異於吳學、常州二脈，當然吾人也可以據此見證戴震學術理念的關懷範疇與獨特進路。到嘉慶年間，沈濤（乾隆？年-咸豐 11 年，178？-1861）提出「十經」之說，他取南朝周續之所言「五經、五緯」，號曰十經。沈濤把經數縮回為五，但卻信取秦漢以來的緯書，並稱其為經，不僅企圖改變經的觀念，也企圖擴大解經的資源，令學術界對經有了較新的意圖。乾嘉間，因為《夏小正》、《曾子》等的研究遂受到重視，阮元等甚至推崇曾子為孔學真傳，所以《大戴禮記》地位昇高。王昶（雍正 2 年-嘉慶 11 年，1724-1806，年 83）有擬納入十三經而為十四經者。¹⁶ 同其時，又因為《說文》、天文、曆算研究已有相當成就，遂有提議納《說文解字》、《周髀算經》、《九章算經》而成十七經者。其中最特別的是段玉裁，這位戴震的大弟子、龔自珍的外祖父、沈濤的老師，竟然在他七十八歲的高齡提出了「二十一經」的主張。除了十三經再加上：《大戴禮記》、《國語》、《史記》、《漢書》、《資治通鑑》、《說文解字》、《周髀算經》、《九章算經》等八種，共為二十一經。¹⁷ 仔細考察段玉裁的意思乃是指：知

14 馬宗霍書，頁 109。

15 參惠棟：《松崖文鈔》卷 1，〈九經古義述首〉、〈春秋左傳補注自序〉。漆永祥點校《東吳三惠詩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文哲所，2006 年 5 月），頁 300、305。

16 王昶：〈汪少山《大戴禮記解詁》序〉，《春融堂集》，卷 36。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第 1438 冊，頁 48-49。

17 嘉慶 17 年（1812）8 月，沈濤為其書齋「十經齋室」求記於段玉裁，段玉裁於 11 月撰成〈十經齋記〉一文，同時也請沈濤為他的「廿一經堂」作記，沈濤遂撰〈廿一經堂記〉。詳沈濤：〈與段茂堂先生書〉、〈十經齋考室文〉、〈廿一經堂記〉，收入氏撰：《十經齋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中國書店據道光 24 年刊本影印，1842 年），卷 1；及附錄段玉裁撰：〈十經齋記〉。並參考劉盼遂：《段玉裁先生年譜》嘉慶 17 年王申條，收入《段玉裁遺書》（臺北：大化書局，1977 年）下冊，頁 1324-1325。

識不斷擴充，原初的十三經早已不敷「學」之需求，也不足以擔當所謂「經典」地位，因此必須增補，建立新的經典範式。雖然，今日的經學家多認為這些經目都只是「私人擬議，未成定論」，¹⁸ 故不予討論。其實，這裡面的含意是極其深重的，不容忽視。

龔自珍面對的時代正是經數與經目劇烈變化的時代，他的理念可以從二方面來談。首先是「六經正名」：確立經數為六，經目為《易》、《書》、《詩》、《禮》、《樂》、《春秋》。至於弟子記錄師傳之言，或經師解經而為一家之言者，則都只是「傳」或「記」，絕非經。如：《大戴禮記》、《小戴禮記》、《公羊傳》、《穀梁傳》等。關於六經的源起，龔自珍認為：「孔子之未生，天下有六經久矣。」六經是三代以來用以治教的典制，蔚為一地之人文風範，所以孔子才說「入其國，其教可知也。有《易》、《書》、《詩》、《禮》、《樂》、《春秋》之教。」因此，他認為六經作為三代政教之本，是不可增刪的。至於周末官失其守、私人講學著述興起之後所出現的簿錄書冊，當如何定位，和六經有何差異？龔自珍則援引《漢書·藝文志》班固「序六藝為九種」的校讎學理論，很清楚的把經、傳、記、群書一一劃分開來。他說：

善夫，漢劉向之為七略也。班固仍之，造藝文志，序六藝為九種，有經，有傳，有記，有群書。傳則附于經，記則附於經，群書頗關經，則附於經。何謂傳？《書》之有大、小夏侯、歐陽傳也。《詩》之有齊、魯、韓、毛傳也。《春秋》之有公羊、穀梁、左氏、鄒、夾氏，亦傳也。何謂記？大、小戴氏所錄，凡百三十有一篇是也。何謂群書？《易》之有《淮南道訓》、《古五子》十八篇，群書之關《易》者也。《書》之有《周書》七十一篇，群書有關《書》者也。《春秋》之有《楚漢春秋》、《太史公書》，群書之關《春秋》者也。然則《禮》之有《周官》、《司馬法》，群書之頗關禮經者也。漢二百祀，自六藝而傳、記、而群書、而諸子畢出，既大備。微夫劉子政氏之目錄，吾其如長夜乎？何居乎，世有七經、九經、十經、十二經、十三經、十四經之喋喋也？¹⁹

六經在孔子之前已經存在，至於傳、記都只是受學者的記錄，不可列名為經。蓋古昔無私人著述，著錄皆藏於官府，受學亦於官府，春秋以降私人講學起於孔子，當時學術是由老師口授弟子各錄所得。但這些記錄都只能稱為記或傳，絕不是經。龔自珍把經數還原為六，遂進一步斥責後世所謂十三經、十四經云云全是錯誤。他分析錯誤之因有二：其一，把「傳」視為經。他特舉春秋為例，指出宋代十三經經目中的春秋就是把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都視為經，把《春秋》三傳訛成了春秋三經。他又說若據此邏輯推論，則《詩》也可以分成魯詩、韓詩、齊詩、毛詩，豈不該有四種詩經？十三經之數只怕還得增加呢。其二，把「記」視為經。蓋劉宋以降至趙宋經數增衍不斷，其中禮經的經目一直包括禮記一目。事實上，大、

18 程發軔：「此皆私人擬議，未成定論，故不列於經目。」《國學概論》，上冊，頁28。周予同在討論完歷代經數的增加之後也說：「綜上所述，經的領域逐漸擴大。現在依普遍的習慣，以十三經為限。十四經的名稱不甚普遍，二十一經不過是個人的主張而已。」同註11，頁853。皆未看出經數、經目變化的學術史意義。

19 龔自珍：〈六經正名〉，《龔自珍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6月。以下簡稱《全集》），頁37。

小戴禮記乃西漢人選輯而成，這些文字在古時原本是單篇行世，後世把選輯成的禮記納入經目，根本是把記當作經。若回考史實，當初單篇行世的《古文記》約有百三十餘篇，難不成禮經也得有百三十一經？其三，把「群書」視為經，如《論語》、《孝經》、《爾雅》、《史記》等等。龔自珍認為這些「書」的作用是「輔經」，載錄當時的歷史、文字、文化等，其本身是獨立的，並不專為解經。因此從學術之本源觀察，經數為六；其他數字，全係臆言。

龔自珍的六經正名直接影響到晚清劉師培。1905年劉氏刊刻他非常著名的第一部《經學教科書》，²⁰開宗明義首章「經學總述」就完全肯定龔自珍的「六經正名」，指出經數應該是六，只有六經才是經之正名。歷代學者無論以經數為九、為十三、十七，全屬荒謬無稽。至於以《大學》、《中庸》為經，更是宋儒偏好，流俗之論，不事正名，積非成是。他說：「及程朱表彰《學》、《庸》，亦若十三經之外，復益二經，流俗相沿，習焉不察。以傳為經，以記為經，以群書為經。此則不知正名之故也。」²¹清儒以專門經學著稱於中國學術史，正名若此，實可為今後治經學者鑑。吾人今日若仍將十三經打成一緝，不分經、傳、記、群書之異，真不知將如何建立經學學術史之觀念，更遑論研治經學學術史？

龔自珍六經正名的另一個理念是：「序六藝為九種」。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念，是清儒建立「學術史觀」的重要宣言。此處只討論其與經數、經目之增減的相關議題。我們都知道班固《漢書藝文志》是中國最早的一部目錄學著作，也是最早的一部校讎學著作。但基本上，班固是沿襲了劉向、歆父子《別錄》和《七略》的分類體系，把古代典籍分成六大類。因此，龔自珍特別表彰劉向《別錄》，他說：

劉子政氏之序六藝為九種也。有苦心焉，斟酌曲盡善焉。序六藝矣，七十子以來，尊《論語》而譚《孝經》，小學者，又經之戶樞也；不敢以《論語》夷于記、夷于群書也，不以《孝經》還之記、還之群書也；又非傳，於是以三種為經之貳。雖為經之貳，而仍不敢悍然加以經之名。向與固可謂博學明辨慎思之君子者哉！²²

劉向把六藝序分為九種，這九種是：《易》、《書》、《詩》、《禮》、《樂》、《春秋》、《論語》、《孝經》、小學。顯然可見的是，前六種為經，後三種不是經。從龔自珍的文字裡我們發現他關懷的不只是為何這不是經的三種書可以與經並列？而是劉向用什麼方法使其與經並列？原來劉向的原則是——視為「經之貳」！然則，經與經之貳，有何差別？又有何意義？這差別可大了。不僅表現出劉向對傳統學術分類上的本末次第，也表現出他對一代學術文化特色的容納。龔自珍在此極力贊美劉向在分類上的分寸拿捏，既納入了時學，又不令六藝一作

20 錢玄同：〈左盦著述龔年〉，民前7年（光緒31年，乙巳，1905年）—民前6年（1906年）載劉師培以教科書為名寫出五種：《倫理教科書》、《經學教科書》、《中國文學教科書》、《中國歷史教科書》、《中國地理教科書》，總名為「國學教科書五種」，是劉師培為國學保存會所編。詳劉師培：《劉申叔遺書》，上冊，總目頁4。是知劉氏《經學教科書》成於1906年之前。稍後有皮錫瑞：《經學歷史》（1906年）、《經學通論》（1907年）等，都較劉書為晚。另一以教科書為名者為關文瑛：《經學教科書》，於1937年出版。

21 劉師培著、龔陳居淵注：《經學教科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7月）第一課「經學總述」，頁5-6。

22 龔自珍：〈六經正名〉，《全集》，頁37。

為學術本源一的地位鬆脫。他指出劉向之所以把三種書納入六藝，是因為漢人及孔門弟子尊崇《論語》、《孝經》，不忍次之於記、於群書；但又必須謹守經／傳／記／群書的分際，不可將他書混雜入經；於是另列此三種於六藝之末，稱之為經之貳。稱之為貳，是推重其輔經的功能。至於小學的文字聲音訓詁，乃治經之樞紐，亦不敢棄去之。

龔自珍這一番委曲婉轉的闡釋，確實是表彰劉向「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眼光和學術分類之高明，但暗地裡卻另有所指。仔細梳理，原來他一方面借此暗諷宋明以降把《論語》、《孟子》納入經，是混亂了經的地位，同時也蔑視了子學的獨立性；不僅未賦予孔、孟一家之言（不專事經）的自創意義，也完全不識學術之本，混淆經／子學術源流。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則是要指出劉向的尊《論語》、《孝經》並非劉向等人欲尊《論語》、《孝經》，而是因為：「本朝立博士，向與固因本朝所尊而尊之，非向、固尊之也。」²³ 這句話很清楚地指出，經數與經目的變易和時代文化的特色密切相關。綜合而論，龔自珍這番議論，一則為六經正名，釐清經數為六，不得增減，十三經等經數之繁衍全屬無據；二則從他對六藝九種分類法的肯定，可以看出他已經開啟了一條經學學術史研究的大道。換言之，經數經目雖不得增減，但經之為「學」的內容與意義，則隨時代需求而變異。經，作為一種文獻研究，或許可以只專注於小學；但作為一種學、一種有發展意義的學術，則絕對不能脫離時代。二千年來，經之註解歷代不同，議題亦每有更迭，經數、經目與時代政治文化變遷緊密相龔，有志治經學史者，豈可不注意哉。

三、區分「六經／六藝」——六藝的知識分化

首先，必須嚴正指出：六經與六藝，在龔自珍的理念裡是兩個不同的概念。²⁴ 「六經」是《易》、《書》、《詩》、《禮》、《樂》、《春秋》六種經，是周史之宗子；「六藝」雖然名目也是易、書、詩、禮、樂、春秋，但既稱為「藝」，就表明它們是傳統學術的六大類（也是六大基礎人文學），不能單單視其為六種經的文本而已。他深深了解劉向、歆父子校定古籍把古代圖書大分為六類（六藝、諸子、詩賦、兵書、術數、方技）、並以「六藝略」領銜的用心。所以文集中反覆分析劉向、歆父子的學術史觀。其中最重要的觀點之一，就是對六經的學術流衍所進行的分類：

善乎，漢劉向之為《七略》也，班固仍之，造《藝文志》，序六藝為九種。有經，有傳，有記，有群書。²⁵

所謂「有經，有傳，有記，有群書」這種劃分等第，確立了六經作為六藝知識載體的大本地

²³ 同上，頁 38。

²⁴ 「六藝」有二種說法，一指《周官》的禮、樂、射、御、書、數；一指《詩》、《書》、《禮》、《樂》、《易》、《春秋》。縱使在漢初，《詩》、《書》、《禮》、《樂》、《易》、《春秋》，有稱之為六經者，也有稱之為六藝者。頗為混用。

²⁵ 龔自珍：《六經正名》，《全集》，頁 37。

位，而傳、記、群書則居於輔助詮釋的位置。龔自珍給予經崇高的地位，同時也肯定經的流傳具有多樣詮釋，他甚至指出在周末王官之學流向私人教授時，就已經呈現了多樣性。因此，六藝略中的每一藝，都各有一經作為大本，其下再分龔若干傳、記、群書，載明此一藝的流傳情況。為了具體瞭解，以下進一層分析：序六藝為九種。

何謂「序六藝為九種」？在此，我們得先約略了解一下劉向、歆父子和繼起之班固《漢書·藝文志》的目錄體系。²⁶《漢書·藝文志》循《七略》把古籍分為六大類，每一類就是一「略」，²⁷計：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術數略、方技略。每一「略」之下又再細分若干「種」，如六藝略下分成九種，計：易、書、詩、禮、樂、春秋、論語、孝經、小學。諸子略下分成十種，計：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家、小說家。詩賦略下分為五種，計：屈原賦之屬、陸賈賦之屬、荀卿賦之屬、雜賦、歌詩。兵書略下分四種，計：兵權謀、兵形勢、兵陰陽、兵技巧。數術略下分成六種，計：天文、曆譜、五行、蓍龜、雜占、形法。方技略下分成四種，計：醫經、經方、房中、神仙。²⁸總計：六大類、38種、596家、13269卷。

依此，六藝略、諸子略、方技略等的六大分類，就類似早期圖書分類有社會科學類、自然科學類、語言文學類云云。九種，則猶如文學下再分詩、戲曲、小說云云。今人見六藝九種，往往惶惑，遂把六藝視同六經，其實是混淆於兩個六字。倘若當年班固將六藝略定名為「周孔略」，周孔略下再分易、書、詩、禮、樂、春秋六類，其下再分九種，又於九種之下，各錄相關書目。豈不分類體系等第清晰，且避開六字之嫌。若以六藝略春秋種為言，以春秋古經領銜，其下錄：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鄒氏傳、夾氏傳、左氏微、張氏微等「傳」。換言之，在漢志的目錄體系裡，「經」與說經之「傳」、說經之「記」、屬經之「群書」，因性質不同，故其從屬關係，上下、等第分明，不可踰越。

除了「略」「種」的目錄分類之外，《漢書藝文志》還有一個體例上的特點——序、論——直接探討了先秦、秦漢的學術源流，十分重要。蓋《漢書藝文志》首列「大序」一篇，是為綱領。先述編纂緣由，再敘經之分派，諸子之興起、秦焚書、漢求書，及至成帝時之校書，劉向、劉歆撰寫《別錄》、《七略》之大要，終至班固據而撰藝文志，把書籍蒐討、編纂的經過，作一總述。其次，在每略之每一「種」中，首列書目既畢，也各附一段「後論」。以六藝略為例，「後論」大要是敘述該藝（經）成書之經過，孔子和該經的關係，書名的含義，一直到西漢經師之授受，部分也談到今文經和古文經的同異。在九種敘述既畢後，附上一段「總論」，談該略之學術源流、得失。²⁹在這個部份，班固論述了六藝之學的變遷，兩漢經學的差異。首先，他認為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治經的方法是「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所以用日少而畜德多，年三十則五經既立。接著他就批評經、傳乖離

26 劉向、歆父子之《別錄》、《七略》和班固《藝文志》在分類上略有不同，詳程千帆：《別錄七略漢志源流異同考》，收入楊家駱主編：《校讎學系編》（臺北：鼎文書局，1977年）。自珍於此，並無詳論。

27 劉向校書，編成《別錄》。劉歆《七略》，指：輯略，六藝略，諸子諸，詩賦略，兵書略，術數略，方技略。「略」是漢代圖書分類的名稱，如同晉以後四部的「部」。

28 根據顧實《漢書藝文志講疏》、陳國慶《漢書藝文志注釋彙編》前言、喬衍琯《中國歷代藝文志考評稿》三書的統計都是596家、13269卷。

29 詳孫德謙：《漢書藝文志舉例》，收入《二十五史補編》（臺北：臺灣開明書店，1959年臺一版），第二冊。

之後，經學走上碎義巧說之途，所謂「談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痛陳漢代經學煩瑣之弊。同樣的，在諸子略，班固也詳述官失其職，子學興起，遊走諸侯，伸其匡時濟世之志。詩賦略，論述詩的功能，賦從先秦至漢的流變；又述兵書、術數、方技各「類」及「種」名的命名含義。³⁰

這種「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大視域，給了龔自珍很深的啟示。於是他匯理清初以來學術發展的新趨向，用自己的識見為〈漢志〉的六略重新作了一番整理，更進一層的是，他整理了清初以降漸趨發展成熟的幾種專門知識，附加在與其可相當的藝類之下，視之為新的學問門類，並稱之為「配」。此舉，有兩層重要意義：一析理出六藝略、詩賦略等的「知識」內容，二使這些在乾嘉間發展成熟的知識被獨立出來，不再渾含概括於六經之下。這就是龔自珍很自豪大膽的校讎學觀點，所謂「六藝之配」：

六藝九種，以誰氏為配？答曰：我其縱言之。³¹

我們先羅列出龔自珍的「配」：

尚書（29篇）：周書（18篇），穆天子傳（6篇），百篇書序，三代宗彝之銘（19篇），

秦陰（1篇，陰符經），桑欽水經（1篇）。

春秋：左氏春秋，春秋公羊傳，鄭語（1篇），太史公書。

禮古經：重寫定大戴記（存十之四），小戴記（存十之七），周髀算經，九章算經，

考工記，弟子職，漢官舊儀。

詩：屈原賦（25篇），漢房中歌，郊祀歌，饒歌。

小學：許慎說文。

「是故，書之配六，詩之配四，春秋之配四，禮之配七，小學之配一。」

又說：

穀梁氏不受《春秋》制作大義，不得為《春秋》配也。

《國語》、《越絕》、《戰國策》，文章雖古麗，抑古之雜史也，亦不以配《春秋》。

《周官》五篇，既不行於周，又未嘗以行於秦漢，文章雖閎侈，志士之空言也，故不以配《禮》。

若夫〈詩小序〉，不能得《詩》之最初義，往往取賦詩斷章者之義以為義，豈〈書序〉之倫哉？故不得為《詩》之配。

還有一些雖不能稱配，但可「附屬通籍」者：

30 詳《漢書·藝文志》。

31 龔自珍：〈六經正名答問五〉，《全集》，頁40。

焦氏《易林》、伏生《尚書大傳》（惠棟輯逸）、《世本》（洪飴孫輯逸）、董仲舒書之第二十三篇（盧文弨校本）、《周官》五篇。此五者，附于《易》、《書》、《春秋》、《禮》經之尾，如附庸之臣王者，雖不得為配，得以屬籍通，已為尊矣！盡之矣！³²盡之矣！

「配」是「匹敵」的意思。古時帝王祭天，以先祖為配。所以配有與之相當、相偶之意。朱熹解釋為「合而有助」，如功臣得配饗太廟，所以也有輔助的意思。在我們解釋為何龔自珍如此配之前，得先留意幾點。首先，他並未為《易》作任何的配書。³³其次，《穀梁》不配春秋，是因為「不受春秋制作大義」。可見在龔自珍的理念裡，經具有孔子的削刪大義，而大義是藉制作來顯現，絕非單純的古史或典制，這和章學誠六經皆史的觀念不同，也是龔自珍為何走上以公羊解《春秋》的信念所在。他在〈五經大義終始論〉一文中，以春秋三世之旨申解群經，不把六經當成單純的史書，更說明他的經學觀和章學誠有很大的差異，尤其是解經方法，差距更大。再次，我們看到戰國晚期的幾本史書如：《國語》、《越絕書》、《戰國策》，龔自珍也不予配經，他的理由是：「文章雖古麗，抑古之雜史也。」可見文章古麗與否，並不是配經的條件，甚至也不是稱史與否的條件，只能歸入雜史之流。這和章學誠以文言史、以文體論史體，兩人的見解差異更大。

其次，我們看一下龔自珍的「配」，並從這些配書中觀察龔自珍如何一一析理出六藝的知識內容。

首先，配《尚書》者：（1）《周書》，古史之屬。（2）《穆天子傳》，史書也是地理書，它記載周穆王在位五十五年南征北戰之事，是考證西北地理的重要參考資料。（3）百篇〈書序〉。這是《尚書》學的歷史公案。〈書序〉作者歷代說法不一，到宋朱熹主張書序非孔子之言，蔡沈作《書集傳》刪去書序。龔自珍治經主今文《尚書》，故主張刪定〈書序〉以為闡釋《尚書》之輔。（4）三代宗彝之銘，著錄金石文字之遺。（5）秦陰（陰符經）。（6）漢桑欽所撰《水經》，是中國第一部記述水系的專書，也是現存最古的地理書和水道書。我們可以說：龔自珍在此企圖分化出「書」這一大類學術的可能細目，包括了：水道、地理、官制、金石文字，甚至古史、傳說。

其次，配《春秋》的有四種：（1）《左氏春秋》；（2）《春秋公羊傳》；（3）《鄭語》（1篇）；（4）《太史公書》。龔自珍取《公羊傳》配春秋，不取《穀梁傳》，原因是穀梁不傳制作大義，前已言及。至於取《左氏春秋》為配，則是因為龔自珍基本上相信左丘明和孔子同時得見百十國寶書，退而修史；因此《左氏春秋》具有輔助瞭解孔子所修《春秋》之史實的功能，所以它不是傳，而是群書，得配春秋。至於只取《太史公書》不取《漢書》，顯然也在制作大義。蓋司馬遷撰寫《史記》志在上紹孔子，暗寓褒貶，成一家之言，立意不同於班固的史書編撰。據此，不難看出龔自珍對春秋之學的態度，絕不只是單純的史書典制，還得蘊含是非經義。這又和章學誠不同了。（按：段玉裁所謂 21 經，則包括《漢書》、《資治通鑑》。詳下）

32 龔自珍：〈六經正名答問五〉，《全集》，頁 40-41。

33 丁四新：〈龔自珍的陰陽五行觀及其影響〉，《江西社會科學》1995 年第 5 期。

其三，配《禮》古經的有七種：(1)《大戴禮記》、(2)《小戴禮記》：蓋漢時禮學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其學皆傳自宣帝時的后蒼，三家並立於學官，並無軒輊，相傳為孔子弟子及後傳者所記，主要討論禮儀法度倫理秩序。傳統的說法大、小戴記分別為漢元帝時戴德、戴聖編輯成書。其後大戴不顯於世，今所謂《禮記》是指《小戴禮記》。清人對《大戴禮記》的研究超過前代。因為古禮經是單篇行世以口授流傳，弟子載錄訛誤淆亂之處甚多。龔自珍的意思是：重新寫定大、小戴記，作為研究古禮的重要參考文獻。(3)《周髀算經》、(4)《九章算經》：都是古代的算學書。前者成書或在秦漢之間，後者西漢張蒼、耿壽昌曾作過增補整理，成書最遲在東漢前期。九章算數將數學問題大分為九類就是九章。梁啟超論清代曆算之學成績時，提到戴震入四庫館，子部天文算學類提要，殆出其手，而用力最勤者，則在輯校各種古算書，待戴校書成，官書局已聚珍板印行，而曲阜孔氏匯刻為《算經十書》，可見清人於算學用力之勤。龔自珍以之配《禮》，是因為「九數為六藝之一，古之小學也。」他指出九數之學是古昔小學教育（指：禮、樂、射、御、書、數六藝）的內容之一，不可與占候等玄談相混，故置於禮學之下。清儒專研天文曆算之學，把古禮學中的重要知識內容一一開發出來，九數之學得以配禮，也說明禮學分化出天文、曆算等的專門知識。(5)《考工記》：約成書於春秋末期（約西元前 770-476），載錄了先秦大量的手工業生產技術、工藝資料，是中國現存最早的手工業技術文獻。分為六大工類：攻木之工、攻金之工、攻皮之工、設色之工、刮磨之工、搏埴之工，包括三十個工種，是制器、工藝、技術之學。它的內容涉及先秦時代的制車、兵器、禮器、鐘磬、練染、建築、水力等技術，還涉及天文、數學、物理、化學、力學、聲學等自然知識。龔自珍特別表揚此書，是因為《考工記》在清儒的研究下已經脫離《周禮》而而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蓋《考工記》在漢時被納入《周禮》補〈冬官〉之佚，漢鄭玄作注，唐孔穎達作疏，歷代研究者並不多見。清儒研治三禮之學，文字訓詁之外，特重名物制度，尤其是繪圖解經。清初江永特別把《考工記》從《周禮》中取出進行考證撰《冬官考工記》，開啟清儒專治《考工記》之風氣。戴震的《考工記圖》就是直接受他影響而完成的。全書繪圖五十八幅，使數千年古器古物的尺寸形制一目了然，尤其是車制，最是詳盡。這是清儒用繪圖解經形式完成的第一部《考工記》研究專著。其後程瑤田、阮元、王宗淶、鄭珍到晚清孫詒讓等，都在這種圖像與「力度辨方之文表裡一存」相互發明的研究方法下展開，揭示了古代手工業技術的形制和圖像。這個在清代獨立發展出的專門知識，為研究中國科技史奠定了重要基礎。(6)《弟子職》：是教養倫理之書，記載弟子事師、受業、饌饋、灑掃、執燭、坐立、進退之禮，是古師相傳教弟子者。今本《管子》中有弟子職一篇，但《漢書龔藝文志》將《弟子職》納入孝經類。清人考證該篇漢時乃單行本，管子作內政以教士乃納入。龔自珍取其配禮，蓋重其教弟子之禮。(7)《漢官舊儀》：禮書也，不僅言及官制，而且大量涉及禮儀，如籍田、宗廟、春桑、酎、祭天等禮儀，所以隋唐史志多列入儀注類。至此，我們可以試著歸納出龔自珍企圖分化出「禮」這一大類學術的可能細目，將包括：典章、制度、教化、禮儀、天文、算學、製器、工藝云云。

其四，配《詩》的「漢房中歌」是一種漢時的楚聲樂府，「郊祀歌」是祭樂，「鐃歌」則是軍樂。我們可以試著說龔自珍企圖分化出「詩」的音樂多元性，不只是性質或功能而已。

至於小學以許慎《說文》為配，則是乾嘉樸學考證經史的基本訓練，識字為先，而《說

文》在沈寂了千年之後大興於清代，正是在小學、《爾雅》之外，必得附加的基礎知識。蓋《說文》勝在字形，《爾雅》勝在訓詁。

以上我們約略分析了龔自珍所論六藝的知識分化。接著我們得探討一下龔自珍為何會興起重新定義六經、又分化六藝知識的念頭？他是否受到某些人的影響？

四、知識擴張與二十一經

龔自珍交遊廣闊，對乾嘉漢學、常州今文學、陽湖文學、乃至對蒙古、西北地理、東南海防問題等都有深刻的認識，他的學術史觀受到浙東章學誠很深的影響，已是事實，縱使尚未找到直接史料。但直接影響到他對經學進行如此大規模反思的，他的外公段玉裁——這位戴震最重要的弟子——應是關鍵之一。民初，章太炎（同治7年-民國25年，1868-1936，年69）曾提出此一觀察，可惜並未深論。以下我們試探討段玉裁的經學態度、和對龔自珍可能產生的影響。

前面已經提過，從經數增衍與經目變化的角度來看，段玉裁在經學史上最特別的，就是他提出了二十一經的說法，把經書的數字增加到了最高。我們試看段玉裁為何提出二十一經？他的理念是：

余謂言學但求諸經而足矣。六經，漢謂之六藝，樂經亡散在五經中。《禮》經，周禮之輔，小戴《記》也。《春秋》之輔，左、公羊、穀三《傳》也。《孝經》、《論語》、《孟子》，五經之木鐸也。《爾雅》，五經之鼓吹也。昔人併左氏於經，合集為十三經。其意善矣。愚謂當廣之為二十一經。禮益以《大戴禮》，《春秋》益以《國語》、《史記》、《漢書》、《資治通鑑》，《周禮》六藝之書、數，《爾雅》未足當之也，取《說文解字》、《九章算經》、《周髀算經》以益之。庶學者誦習佩服既久，於訓詁名物制度之昭顯，民情物理之隱微，無不瞭然，無道學之名而有其實。余持此論久矣，未敢以問於人。³⁴

這篇〈十經齋記〉是段玉裁為他的得意弟子沈濤的書齋——「十經齋室」——所寫的記文。前已言及，沈濤把經數增加為十，是納入了五種緯書。他認為「緯」實始於太古，和「讖」同出異名，只不過讖雜占驗，而緯則輔儷經書。他甚至認為七緯之名，是源自孔子因七經而定之名。他引劉熙《釋名》：「緯，圍也，反覆圍繞以成經也。」雖然《漢書·藝文志》九流十家中無讖，後人遂視之為偽書。實際上《漢書·藝文志》所錄圖書秘記多為讖緯之書，連《史記》中也多有載錄。沈濤把緯書重新納入經，他的目的是「永宏秘經，考信六藝」，³⁵不僅發金匱之遺書，同時也重新開啟經學的學術源頭，使經的研究文獻不僅只限於那六種。

34 段玉裁：〈十經齋記〉，《經韻樓集》卷9，收入《段玉裁遺書》（臺北：大化書局，1977年）下冊，頁1046。

35 詳沈濤：〈十經齋室考文〉，收入氏著：《十經齋文集》卷1，引文出自該卷，頁5。並參考沈濤：〈廿一經堂記〉，同書，卷1；〈治經廬記〉，同書，卷4。

用今日的話語來說，就是「開發學術新資源」。

段玉裁與沈濤對於「何謂經？」的討論，並不因這篇記而終止，有趣的是，段玉裁不僅在這篇記裡表明他醞釀多年的二十一經理念，同時也邀請沈濤為他晚年授徒的——「廿一經堂」寫記。沈濤的這篇記頗類似一篇簡短的經學史，他的主要觀點是認為：經的意思是常、是常道，具有存治亂施諸四海的政教功能，因此經數是可以隨時代需求而改變的。首先，他說孔子以前並無經名，縱使三代官府載錄圖書用以教授士子，但並無稱經者。他認為六經之名起於孔子，把五經定為五常之道也始於孔子。接著他就概略說明歷代所謂經之內容的變化：漢時有五經（《易》、《書》、《詩》、《禮》、《春秋》）；唐宋以後因經術隆升，取士遂有九經（前五經中，禮分為三禮，春秋分為三傳）；宋熙寧朝罷了三禮；明代又歸返舊制並加上《論語》、《孝經》、《孟子》、《爾雅》，成為十三經。沈濤的這個定義很影響了他的經學觀點，也因為如此，他才提出自己的十經說，以增加經數的方式，來開啟學術資源。也因為這個定義，他才會積極肯定段玉裁把經數擴增到二十一。他說大、小戴記共事曲台，所以禮宜益以《大戴禮記》；《史記》、《漢書》、《資治通鑑》都是續前朝之史存古訓治亂，功能等同《春秋》，所以得增益於《春秋》；至於《說文解字》、《九章算經》、《周髀算經》更是小學之至要，足以補《爾雅》訓詁之未備。³⁶

段玉裁寫這篇記時已經七十八歲，應該是他學術生命最成熟時的定論，也是他晚年「築堂以授生徒、扶微學」的最終心願。他之所以在十四經外，納入了四種史書、一種小學書、二種算學書，顯然是因為他觀察到隨著學術的發展，被稱為經典的知識範疇必須擴大。尤其是他發現《周禮》六藝之學中的「書、數」，非《爾雅》一書所能承載，所以不僅主張增入《說文》以輔助小學，更應增加《周髀算經》、《九章算經》兩種算學書，以彰顯「數」之學的知識內容。至於納入的四種史書，顯然是有鑑於當時史學界所建立起的史學經典。其中較值得我們留意的是，段玉裁使用的模式和龔自珍相似：為六經作配；雖然他用的動詞是：輔、益，如「周禮之輔」「春秋之輔」「益以國語」，而龔自珍用的名詞則是「配」。

以上我們敘述了段玉裁和當時學界的關懷。在結論處我們得仔細分析一下龔自珍和他們的差異，以展現龔自珍觀點的重要性。

五、結論

段玉裁的二十一經和龔自珍的六藝論看似相似，其實完全不然。他倆的不同絕非所舉以配經的選項不同，而是兩人對「經之為學」的理念完全兩途。段玉裁仍然沿襲六經、十三經云云的傳統敘述，把經當作一種冠冕，一種肯定某種學問經典位置的冠冕，雖然他們已經考慮到因應時代需求可以增加新的典範納入經，較諸固守著六經、傳、記的經生而言，已經開啟並納入了史學、曆算等的新局面。但因為他們堅守一切學問的中心者必須被稱為經，所以經數的不斷增加，對他們而言是被允許的。因此，他們不只讚美十三經的出現，自身在面對新知識的發展時，也同樣以增加經數和經目來肯定新學。他們未曾細究經之大本，也未曾梳

36 詳沈濤：〈廿一經堂記〉，頁9-11。

理經之為學的歷史發展。若與之前的十三經等說法相較，或許可以說，沈、段所謂的經已不是之前固守經數為六的六經之學的經，反倒較類似今人所說的「典範」，是經典的意思。既是經典，個個學科皆可以有經典，當然不必限於六這個數字了。

段玉裁的二十一經，無論從實質或表面看來確實是擴大了學術典範的概念與內涵，必須被視為一種進步，尤其納入史學、算學等的新典範。但他最大的疏失，是未能把握住六經作為古代政教大本的地位。龔自珍則從「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學術史大視角，肯定六經／六藝的源流關係，同時重新思考經、史、子、集的定位。他想要分辨出：古史與經的關係、經的出現與流傳、經學與子學的差別、秦焚書與漢初的經學傳衍、西漢以後的經與家法等等，全是古代學術史之發展的大議題。龔自珍有極深厚的經學、史學、子學和文學、佛學造詣，他把經當作治教之本，視其為一種整合性的學問。觀察其源，索驥其流，才能掌握學問的源出與流變。所以，源與流是很清楚的被劃分的。學術史所謂「辨章學術、考鏡源流」，要點就在於此。因此，他一開始就堅持經的數字只是六，不得增減。他說：孔子未生，天下有六經久矣，孔子述而不作。³⁷ 經是三代的典制史錄政教之本，不同於私人載錄。至於學術下私人之後所出現的各種論述記錄，都只能稱為傳、記、群書，輔助瞭解經義則可，卻不能被稱為經。所以，他堅決反對經數增衍，無論十三或二十一。龔自珍的這個理論為經學作了很重要的宣言，他清理了經的源頭，釐清了經數與經目，也梳理出六經之學的流傳：在體裁上有傳、記、注、疏之別，在家派上，更是自秦漢以來就呈現多家並列、同傳於世的局面。漢景帝時所立春秋博士就有兩家（董仲舒、胡毋生）；漢武帝時所立五經博士，也非五家，而是七家；到漢光武帝時五經博士更立為十四家³⁸；可見經的流傳在漢初就是以「家」為單位的多元，並非後世所拘執的一家傳經云云。龔自珍分辨經與經之流傳，建立起經學史的多元發展史觀；同時彰顯劉向「分六藝為九種」的校讎學觀點，以六藝伸展六經之學的歷史變化，建立了「經學學術史」的研究視角。肯定經之為學的時代變遷，而非一元正統。

至於清初以降發展出的新學門，龔自珍則以配的方式，把他們懸於六藝之下。乍看之下，似乎地位較低，不如段玉裁的等列於經。其實龔自珍這種分列方式，有雙重意義：一，給予這些新起的專門之學以獨立的地位；二，說明這些新起的學門，源出於六藝的某一藝，表明學有其本，戒惕學術不可流於「工具性的技、藝」。這種兼顧本末、緣起、與發展的學術史眼光，在清儒中是很罕見的。近代學者每每稱揚龔自珍，卻未見及此，殊是可憾。

最後我得說明，龔自珍的六藝分化並不是一個完美的論述，甚至也不完整。他的六藝之配，有些是為了鉤沈古史、存文獻、徵考辨，屬一種文獻目的，他的六藝之配也未必完全合理。但作為歷史發展進程的一環，龔自珍確實提供了很關鍵性的理論。這又可分兩方面來談。

首先，面對之後的學術發展而言。今日我們探討傳統學術的近代轉型，清乾嘉學者發展出的專門之學，實際上代表著傳統學術在十九世紀所展現的分化。龔自珍在「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大視域下，為六藝、詩賦二略，重新董理出多種專門知識，若再對照龔自珍論阮

37 詳〈六經正名〉、〈古史鉤沈論二〉，《全集》，第一輯，頁36-37；頁21-25。

38 十四博士為：「《易》四：施、孟、梁丘、京氏；《尚書》三：歐陽、大、小夏侯；《詩》三：魯、齊、韓氏；《禮》二：大、小戴氏；《春秋》二：公羊嚴、顏氏。」詳馬宗霍，《中國經學史》，頁40-41。

元學圈學術成就時所羅列的十大項專門之學，³⁹ 並與近代與西學接觸後形成之相關專門學科相勘，我們就不得不承認傳統學術在十七到十九世紀的知識蓬勃發展下已經發生轉型，傳統學術的分化和專門知識的出現，是明顯指標。至於，每一專科的發展詳情，則有待作更深入的個別專題探討。

其次，揭明六藝乃傳統學術之本源。龔自珍把六藝從六經的概念中擴充出來，以校讎學的觀點審度六藝，把六藝視為遠古學術的六大類型，說明每一藝的學術性質，梳理每一藝所含具之潛質性知識，同時顧及學術的時代發展性與衍生性，這也就是他頻頻讚美劉向「序六藝為九種」的蘊意所在。此一理念最重要的就是把六藝視為傳統學術本源，為有志考辨千古學術流變者立下一個「律令」，亦即學術基軸。龔自珍所揭示的六藝理念，對晚清學術轉折期的重要思想家如章太炎、劉師培、馬一浮等都產生了深刻的啟示，並在晚清中西學術交鋒的年代，展現出另一種翻騰。⁴⁰

39 龔自珍把乾嘉專門之學大分為十類：訓詁之學（含音韻，文字），校勘之學，目錄之學，典章制度之學，史學（含水、地之學），金石之學，九數之學（含天文、曆算、律呂），文章之學，性道之學，掌故之學。其實包含十五類。詳龔自珍：〈阮尚書年譜第一序〉，《全集》，頁 225-227。參考拙文〈龔自珍論乾嘉學術：說經、專門、與通儒之學——鉤沈一條傳統學術分化的線索〉。

40 梁啟超在談到龔自珍對晚清學術的影響時，曾慨嘆「複雜」，頗有不知從何說起之感。氏著，《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頁 110。近來已有學者注意到「六藝」在民初學術論述中的重要性，如討論馬一浮的「六藝含攝一切學術」等，但卻罕見論及龔自珍區分六經與六藝的開創性意義。